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国际安全译丛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Stephen Walt and His Critics

理性选择与安全研究： 史蒂芬·沃尔特及其批判者

[美] 迈克·E. 布朗 (Michael E. Brown)

[美] 小欧文·R. 科特 (Owen R. Coté, Jr.)

[美] 肖恩·M. 林-琼斯 (Sean M. Lynn-Jones)

[美] 史蒂芬·E. 米勒 (Steven E. Miller)

编

查雯 梁策 译

Stephen Walt's "Rigor or Rigor Mortis" has sparked a spirited debate that will be an important and useful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Whatever one's position on the issue, Walt's call for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iversity should be welcomed by all students of security studies.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译丛

理性选择与安全研究：

史蒂芬·沃尔特及其批判者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Stephen Walt and His Critics

[美] 迈克·E. 布朗 (Michael E. Brown)

[美] 小欧文·R. 科特 (Owen R. Coté, Jr.)

[美] 肖恩·M. 林-琼斯 (Sean M. Lynn-Jones)

[美] 史蒂芬·E. 米勒 (Steven E. Miller)

◎ 编

查 雯 梁 策 ◎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Selection and Preface, copyright © 2000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and of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MIT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WORLD AFFAIR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选择与安全研究：史蒂芬·沃尔特及其批判者 / [美] 迈克·E. 布朗 (Michael E. Brown) 等编；查雯，梁策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6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译丛/王帆主编)

书名原文：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Stephen Walt and His Critics

ISBN 978-7-5012-5752-2

I. ①理… II. ①迈… ②查… ③梁… III. ①国家安全—世界—文集

IV. ①D81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25838号

图字：01-2016-4342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汪 琴
王勇刚
陈可望
李 辉

书 名

理性选择与安全研究：史蒂芬·沃尔特及其批判者

Lixing Xuanze Yu Anquan Yanjiu: Shidifen Woerte Jiqi Pipanzhe

编 者

[美]迈克·E. 布朗 (Michael E. Brown) [美]小欧文·R. 科特 (Owen R. Coté, Jr.) [美]肖恩·M. 林-琼斯 (Sean M. Lynn-Jones) [美]史蒂芬·E. 米勒 (Steven E. Miller)

译 者

查 雯 梁 策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9 1/4印张

字 数

16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6月第一版 2018年6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752-2

原版书号

ISBN 978-0-262-52275-5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译丛得到外交学院国际关系
国家级重点学科资助

总序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旧的力量平衡被打破,新的力量平衡尚未形成,世界继续向着不确定的方向变化发展。大国关系已出现变化。冷战式的大国政治对抗模式已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基本需要,随着和平观念的深入人心,大国间相处日益重视协商、协调等和平方式,大国间竞争日益集中在制度建设、制度创新、文化传播等软权力领域。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全球经济风险、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和网络战等问题为人类带来的威胁并不亚于传统的安全威胁,因此也日益成为各国外交的重点议题,日益成为媒体和学术关注的焦点。

面对国际安全形势出现的新变化,需要研究新问题,探究新方法。在这方面国内的国际安全研究学界已有了大量的成果。一方面,学者们对中国与世界性大国、与地区组织和世界组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探讨,从不同的角度为我国外交战略规划建言献策。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能源安全、经济安全、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网络空间安全等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既有宏观的战略性判断,也有技术性的分析。1999年王逸舟教授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和2003年陆忠伟主编的《非传统安全论》都是该领域研究的突出成果。

然而,由于起步较晚,我国的国际安全研究总体而言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现有国际安全研究的动态和前沿成果了解不足,这就导致盲

从、跟风甚至是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时有发生。这一问题反映出我国学界研究自觉不够，研究水平还有限，前瞻性意识和学术独立性缺乏等弊病。因此，可以说我国当前的国际安全研究仍然处于相对滞后的位置，仍然需要进一步拓展、深化和提升。发展中国的国际安全研究，一方面可以形成以非传统安全为突破口的中国特色安全研究，另一方面也仍然需要大量有区别地借鉴西方国际安全研究的已有成果。二是在国际关系领域，西方国际理论的译著已经较多，而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译著仍有不足。这也是我们翻译这套丛书的原因之一。

国际安全研究一向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向国内介绍一批先进的国外国际安全研究成果，借以丰富我国学者对于国际安全研究的方法意识、提高学术水平也是我们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课题和职责。需要说明的是，向中国国内译介国外国际安全问题最新研究成果的想法其实已经由来已久了，但因涉及版权交易等事宜，迟迟未能实现。现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安全译丛”终于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这对于国内学者、学生和对国际安全研究感兴趣的读者都是一件好事。

该丛书主要有三大特色。第一，所有著作都是围绕国际安全议题的、相当有影响的著作。第二，所有著作都是近十五年内新出版的作品，也即在冷战后国际安全新形势下的著作。第三，博采众家之长。本译丛通过选择不同流派、不同安全议题的国际安全研究成果，力图让读者对国际安全研究有全面而客观的了解。

本译丛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属于基础类，通过阅读这类书可以丰富读者对国际安全研究的理解，强化对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能力。其中，《当代安全研究》和《安全与国际关系》是评介性的教材。《安全与国际关系》是一本对经典安全学派进行评介和分析的经典教材。书中，它对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进行了分析评估，以检验他们是否能够解释冷战的发展和结束。而同样作为教材的《当代安全研究》则将重点转向介绍国际安全领域涌现的新研究方法，讨论新的安全概念和安全领域的热点问题，是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领域的新理论、新视角和新方法的系统梳理和全面阐述。

《理性选择与安全研究》是一部国际安全问题领域中，探讨理性主义方法是否过时的辩论文集。该书起源于史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

1999年在《国际安全》发表的一篇对理性主义的方法是否适宜于安全研究的质问性文章^①，他认为理性主义方法的研究路径既没有导致新的、富有成效的理论解释，也缺乏经验现实的支持。该观点引起了对理性主义的广泛讨论，这些讨论被该书收录成集。阅读此书可以对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有更加客观公正的认识。

第二类是对国际安全研究问题的分析性著作，阅读这类书有助于读者模仿和学习书中研究方法、培养思辨能力。因此，这里面既包括传统的理性主义研究方法，也包括建构主义研究方法；既包括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也包括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但无论运用哪种研究方法，都是解决国际安全领域的重要问题并做出完美解答的佳作。

《不完美的联盟：时空维度的安全制度》所使用的方法是理性主义，目的在于将新自由制度主义应用于安全制度的研究领域，以丰富安全研究的视野。本书探讨了一系列安全制度，如北约、欧盟、联合国维和机制、东盟地区论坛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通过观察这些制度的变化和效用，探究影响合作的条件，为国际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答。

《安全共同体》由阿德勒（Emanuel Adler）等人编著，是一本建构主义安全研究著作。该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向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安全共同体理论致敬之作。一直以来，安全共同体理论一直因忽略权力、过于理想等而被现实主义者所批评，但是现在安全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全球治理呼声不断高涨，阿德勒等人以建构主义的新方式重新构架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体系，以此说明一个分享共同价值和规范的国际社会并非是理想主义的空中楼阁，国际社会是能够存在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受之影响会被导向合作与和平。

另一部建构主义著作是《核不扩散规范：国家为什么选择核克制》。面对全球95%的国家选择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际现状，该书提出的研究问题是：有核能力与核意愿的国家为什么会选择核克制？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成本收益计算和偏好塑造是国家选择核克制的动力机制。而偏好塑造又包括身份认同与规范说服，后者是作者通过借鉴社会心

^① Stephen Walt, "Rigor or Rigor Mortis? Rational Choice and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3, No. 4 (Spring 1999), pp. 5-48.

理学研究成果所发展出的创新性研究路径。通过分析利弊，作者认为规范说服的方式是驱动程度最高的。

最后一本是属于哥本哈根学派的《作为实践的安全》。通过话语分析方法分析波斯尼亚战争，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与以上所有书都有所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其研究路径上，还体现在其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上：本书的目的在于探讨作者与政治家在寻求建立自身权威时，话语文本体裁如何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在分析过程中，作者解释了相互竞争的外交政策争论话语是如何影响国家身份的，由此可见，作者是站在质疑权威、怀疑话语公正性的后现代主义立场上的。阅读本书可以加强读者对新研究方法的认知与应用，以更为灵活和创新的方式分析国际安全问题。

希望这套国际安全译丛的出版会让读者对国际安全研究有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认识，让国际安全研究领域出现更多的新方法和新视角。也希望这套译丛能成为国际关系安全研究的参考书，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也希望同行、学界同仁能够多多批评指正。

王 帆

2014年5月

作者简介

迈克·E. 布朗 (MICHAEL E. BROWN): 任教于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 沃尔什外交服务学院, 为该院国家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并任《国际安全》期刊编辑。

小欧文·R. 科特 (OWEN R. COTÉ, JR.): 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副主任,《国际安全》期刊编辑。

肖恩·M. 林-琼斯 (SEAN M. LYNN-JONES):《国际安全》期刊编辑, 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史蒂芬·E. 米勒 (STEVEN E. MILLER):《国际安全》期刊总编辑,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

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莉萨·马丁 (LISA L. MARTIN):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詹姆斯·莫罗 (JAMES D. MORROW):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牛铭实 (EMERSON M.S. NIOU): 杜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彼得·奥德舒克 (PETER C. ORDESHOOK): 加州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罗伯特·鲍威尔 (ROBERT POWELL):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罗宾森教授。

史蒂芬·沃尔特 (STEPHEN M. WALT):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埃

夫龙与珍妮·柯克派翠克国际事务教授。

弗兰克·扎格尔 (FRANK C. ZAGARE):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政治学系教授、系主任。

致 谢

本书编者感谢所有为本书提供帮助的人，尤其感谢哈佛大学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该中心在《国际安全》的编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还感谢纽约卡内基集团提供的帮助。特别致谢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戴安娜·麦克雷 (Diane McCree) 与米拉·基冈·扎哈尔 (Meara Keegan Zaheer)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提供的重要帮助。

前言

肖恩·M. 林-琼斯 (Sean M. Lynn-Jones)

梁策 译

ix 本书集合了围绕理性选择 (rational choice) 方法——尤其是形式方法 (formal methods) 及数学模型——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的角色所展开的一系列辩论。本书搜集了原于1999年发表在《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 期刊上的相关文章。史蒂芬·沃尔特 (Stephen Walt) 于1999年发表在该期刊春季号的文章《严谨还是僵化？理性选择与安全研究》开启了这场辩论。沃尔特的文章针对形式模型和理性选择方法在安全研究中的应用展开了范围广泛的批判。在《国际安全》期刊编辑的邀请下，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 (Bruce Bueno de Mesquita)、詹姆斯·莫罗 (James Morrow)、莉萨·马丁 (Lisa Martin)、牛铭实 (Emerson Niu)、彼得·奥德舒克 (Peter Ordeshook)、罗伯特·鲍威尔 (Robert Powell) 和弗兰克·扎格尔 (Frank Zagare) 于同年的秋天在期刊上对沃尔特的文章作出回应。沃尔特也同时针对以上学者的批判给予解答。在这本书里我们集合了这些文章，希望将这场辩论更及时地呈献给一个更广泛的读者群体。

本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来源于一个更广泛的学术争议，这个争议于近十几年来在政治科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了激烈的讨论。^① 更多的学者开始使用理性选择方法 (rational choice methods)，从博弈论到各式复杂的数学模型，并广泛将其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及其他社会

^① 关于理性选择和形式模型在政治科学中崛起而引发争议的概要，参见 Jonathan Cohn, "Irrational Exuberance," *The New Republic*, October 25, 1999, pp.25-31.

科学领域。这些学者通常假设行为体 (actors) (从选民、立法委员、领袖到主权国家) 都必然有一系列的目标, 因此行为体会通过理性的行为达到这些目标。这些假设可被用于建立一套具有完整逻辑性的命题, 用来预测行为体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模式。在政治科学研究中, 形式模型 (formal models) 被广泛应用于美国政治的研究。博弈论则被学者长期用于研究威慑 (deterrence)、危机谈判 (crisis bargaining) 以及国际合作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概括地说, 形式模型在近几年中渐渐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安全研究。学者选择使用形式模型的理由如下: 相较于其他研究方法, 例如历史片段的案例研究法、思想分析、社会准则和信条研究, 以及心理学中洞察力的应用等, 形式方法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并且通过不断发展, 更有可能形成一套系统的研究方法, 因此得以取得积累性的进步。

然而, 在理性选择和形式模型变得更加主流的当下, 倡导其他研究方法的学者们针对这一研究方法和使用它的学者们进行了学术批判。理性选择的批判者们认为: 形式模型无法捕捉现实政治行为复杂的一面。无论多么精确和符合逻辑的公式, 都无法代替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深入剖析。另一部分批判者则指出: 理性选择和形式模型建立在关于行为体动机 x 的不切合实际的假设之上。在这些学者看来, 形式方法 (formal methods) 对我们理解并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贡献很小。更多的批判声音是对于支持并使用理性选择方法的学者们的控诉。很多人认为“理性选择者” (rational choicers) 不容反对声音出现, 并坚定地要理性选择派在各个院系乃至整个政治科学领域称霸。^①

在文章《严谨还是僵化? 理性选择与安全研究》中, 史蒂芬·沃尔特指出, 近期形式理性选择理论 (formal rational choice theory) 的应用为当前安全研究仅提供了有限的新命题和启迪。他发现无论是技术手段还是理论化的过程, 最新一批的研究都未能显著地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安全这一领域。与此同时沃尔特指出, 这场关于理性选择的优势的辩论, 不仅对于学者个人的学术发展有重要作用, 而且对于政治科学这一领域未来的发展亦非常必要。如果偏爱理性选择的理论家占据学术的主导地位, 他们不可避免地偏重某些而忽略了其他方法、议题和研究途径。

沃尔特认为, 理性选择的研究途径具有以下五个特点。第一, 理性选

^① 关于更多的支持和批判理性选择的代表性文章, 参见本书的“延伸阅读”。

择理论假设一种政治或社会行为是某单一行为体选择的结果。第二，这个理论假设每一个行为体都试图将主观期望效用（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最大化。第三，我们必须能够为每一个行为体的偏好按照大小排序，且其偏好必须具有传递性（如果行为体在A和B之间偏好A，B和C之间偏好B，行为体必然相对于C偏好A）。第四，形式理论涉及指定博弈的结构——确认参与者，他们各自的偏好和信息，以及他们是如何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第五，理性选择的理论家尝试找出博弈中的均衡——对于战略的选择创造了这样的状态，即没有行为体有单方背叛的动机。尽管某些支持理性选择的理论家对以上几点不尽认同，沃尔特认为这几点恰当地描述了近期安全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学中理性选择的应用。

xi 我们应当如何评价理性选择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的学术成果呢？沃尔特认为，评断理性选择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理论的标准有以下三点：第一点是逻辑的一致性（consistency）和准确度（preciseness），第二点是理论的原创性（originality），第三点是实证有效性（empirical validity）。后两点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在逻辑上具备一致性和准确性的理论仍有可能是不重要甚至是错误的。沃尔特强调好的理论是能够“生产关于人类状态的精准且相关的知识”。基于这点，沃尔特对理性选择模型是否符合以上所述三个标准做出评价。

沃尔特认为，理性选择的方法可以使理论在逻辑上更加精准和一致，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理性选择方法比其他研究方法更为优越。用形式和数学语言表达理论是有价值的，它可以让研究者更容易注意到理论中的各种假设，从而更好地核实预测的结果是否与最初设想一致。尽管如此，沃尔特指出，其他的理论（非形式理论）也同样可以是准确并且逻辑一致的。此外，理论即使并不完全具备这两种特性，也可以为人类知识作出贡献。国际关系中一些重量级的理论，例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的一致性差，但仍不失为有影响力和启迪性的好理论。沃尔特强调，即使是逻辑上一致和准确的形式理论（formal theories），如果这些理论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上，或具有多个均衡，这些理论仍然有缺陷，因为它们无法清楚地给出预测。追求一致性和精准度，形式理论也为此付出了一定代价。建筑在复杂数学模型之上的形式理论将许多没有受此训练的学者和读者排除在外，也因此无法获得足够的理论评判和在现实中应用的机会。

沃尔特还指出,最近的一批用理性选择研究安全问题的文献普遍不能满足衡量理论好坏的第二条标准,即创新性——这些理论不具备创新性和原创精神,近期的研究没有创造出新颖的理论或假说。沃尔特引用了大量的理性选择的研究成果作为对他观点的支撑。他认为这部分研究不具备创新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展现出了“方法论上的用力过猛”。从阐述式模型(elaborate models)得出的理论成果很多并无重要意义。例如,形式模型得出一系列显而易见的结论:当一个国家认为对方的军事实力更高时不会主动发动危机;能从战争中获益的国家更有可能发动战争;国家通过结盟以加强防御。所有这些结论对于不使用形式模型的学者来说都不算是令人惊讶的。第二,形式模型出产的经常是“装在新瓶子里的旧酒”,事实上只是旧的论证以新的风貌呈现而已。例如,“承诺问题”和“私有信息”导致理性国家本可以避免的战争,这样的观点重复了长期存在的关于国际政治中无政府主义与秘密的恶性结果的观点。xii

沃尔特认为形式方法为一系列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其中包括威慑、军备竞赛、结盟、合作等。但与此同时非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作出了相同的贡献。因为形式研究方法围绕着数学模型的逻辑展开,因此忽略了对现实中的问题的探索。沃尔特同时注意到威慑理论的根源并不来自形式模型,而是历史分析以及试图解决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策困局的尝试。

衡量好理论标准的第三条是实证有效性。沃尔特认为多数用形式方法研究安全问题的著作没有进行实证检验,其理论也因此缺乏实证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形式分析依赖于数学模拟。不过一些近期发表的文章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验证。沃尔特分析了其中两个最为突出的作品,即布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和大卫·拉尔曼(David Lalman)的《战争与理性:国内与国际规则》,牛铭实、彼得·奥德舒克和格雷戈里·罗斯(Gregory F. Rose)的《均势:国际体系中的稳定》。

沃尔特发现《战争与理性》中的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并非严谨的验证。布鲁诺·德·梅斯奎塔与拉尔曼依赖原始的指标测量“风险倾向”“效用”以及“不确定性”这些概念,这种方法无法精准地测量主要变量。将8种可能的结果填进2乘2的观测结果与预测结果的矩阵中,这种做法将预测结果发生了的案例与那些预测结果没发生的案例堆到一起,因此夸大了模型的预测力。并且,《战争与理性》的案例分析亦没有为模型的预测效果提供有力的证据。沃尔特指出,两位作者在文中采用的事实论据,例如法绍

达危机，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对峙，以及中印战争，都与模型作出的预测相悖。

xiii 尽管《均势》一书存在一些优点，例如：清晰的逻辑，坦诚地承认模型的局限性，以及一些反直觉的推测。但沃尔特认为，该书同样无法为其理论预测提供实证支持。牛铭实、奥德舒克和罗斯利用临时的（ad hoc）因素（例如，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争议使1871—1914年法德结盟变为不可能的观点）来解释结盟的决定为什么与模型预测不符。并且，他们并没能体现现实中的国家做出某种决策是出于模型指出的原因。例如，模型预测一个国家为了使国际格局更加稳定，会自愿将资源转移给另外一个国家。但在现实中，一个国家几乎从不会无条件地转移资源。最后一点，沃尔特认为《均势》推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因为俄罗斯对德国发起的预防性战争而开始——这一解释不具备说服力。这个解释可能支持模型的推断，但公然违背了许多史实。

沃尔特总结，在安全研究领域中，理性选择并不比其他研究方法更科学或更有价值。形式研究可能加强理论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但并没有产生更有效或更具创新性的新理论。大多近期的形式研究的学术文章甚至未经过实证检验。并且，当学者尝试为由模型推导出的理论进行实证测验时，其结果往往与预测结论相悖。

沃尔特同时指出，形式方法的流行负面地影响了安全研究这一领域对于研究实际中安全问题的能力。这是因为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对研究真实世界中的安全问题贡献极少，因此这种方法的推广会将安全研究导向“热衷于枝节问题”的方向，以至于产生大量在现实中无法得到应用的研究。形式理论的学者大多具备高技术性的分析方法，但对政治与历史却了解甚微。如果安全研究这个领域被形式理论家主导，那么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将会与当下的安全议题完全脱节。

因此沃尔特强调，安全研究应当海纳百川，支持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所以形式理论和理性选择不应当支配、主导这一领域。学者应该继续追寻更广泛和多元的研究方法，包括形式理论、统计学分析法、历史案例分析和建构主义分析。这样，安全研究这一学术领域才能保持活力，继续发掘和研究现实中的重要问题。

本书接下来收录的五篇文章是针对沃尔特对形式理性选择理论和方法的批判做出的回应。在《整理众多意见》一文中，布鲁斯·布鲁

诺·德·梅斯奎塔与詹姆斯·莫罗反对沃尔特，并为形式理论和理性选择方法正名。他们认为，逻辑一致性是衡量理论质量的最重要标准。如果理论在逻辑上不一致，基本上可以从理论中衍生出任何假说，这使得实证检验变得不可能。逻辑上不一致的理论也无法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帮助，因为它们可以为不同的政策建议辩解。而形式模型恰好能够通过以下途径迫使研究者注意并消除他们理论中的逻辑不一致：(1) 形式模型的要求言明假设；(2) 通过明确不同结论的条件消除明显的逻辑矛盾；(3) 将实证规律整合成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4) 指出此前被接受但不能推导出来的结论。两位学者在文章中用实例解释了用形式模型做研究的学术作品是如何达到以上四个目标的。xiv

布鲁诺·德·梅斯奎塔与莫罗还认为，形式模型创造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发现和新颖的结论。二位重新审视沃尔特引用的文章，并指出这些文章中很多都提出了新的理论，而沃尔特却避之不谈。即使形式模型获得的结论重复了以往用非形式模型得出的结论，这不代表形式模型毫无价值，它的价值在于为接受一些见解和拒绝另一些提供了逻辑基础。举例说明，布鲁诺·德·梅斯奎塔与拉耳曼的《战争与理性》提出了不凡的假设以及很多实证检验，这些检验已经被很多学者复制。

布鲁诺·德·梅斯奎塔与莫罗认同沃尔特的“社会科学应当指导公共政策”的看法，他们认为形式模型能为发展政策相关的知识做出贡献。他们指出，布鲁诺·德·梅斯奎塔的“预期效用”模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基础研究可以产生提供政策建议的实用工具。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一些政府机构就曾使用该模型。

在接下来的文章《理性选择的贡献：为多元化辩护》中，莉萨·马丁作为形式理论的使用者，认为安全研究这个领域将会因为不再使用形式理论而萧条。虽然沃尔特鼓励多元化，马丁指出沃尔特的文章旨在减弱形式理论在安全研究领域的使用。马丁在她的文章中针对沃尔特的观点作出以下回应。第一，她认为沃尔特忽视了形式方法在创造完整的和逻辑严密的理论命题这一方面的极大优势。她强调，沃尔特认为形式方法缺乏独创性，却忽略了形式方法独特的优势。马丁认为，建构社会科学理论需要建立一个将相关命题整合在一起的建筑群，而形式模型恰好能够让学者将理论假设和命题清晰地、逻辑地整合起来。

第二，马丁认为将非形式的理性选择研究形式化有很重要的意义。在